

“守先待后”：试述余英时师从钱穆的经过及其学术传承

叶汉伦 黄文斌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马来西亚 雪兰莪州 43000)

[关键词] “守先待后”; 钱穆; 余英时; 《余英时回忆录》; 学术传承

[摘要] 钱穆与余英时师弟子二人在中国史研究中前后辉映, 其间的治学渊源脉络清晰。余英时师从钱穆的经过, 与其学术传承的关键处, 正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个案。“守先待后”, 既是中国学术传统, 也是治学要领。余英时出于偶然的机遇得以师从钱穆, 继承与发扬“守先待后”这一学术传统在钱、余两代学术传承中具有重大意义, 可视为钱余师弟子之间的关键纽带。余英时坚持钱穆所叮嘱的“守先待后”的传统治学之方, 以一生扎实的研究成果来验证并发扬这种“守先待后”的治学传统。余英时的学术坚守, 不仅是告慰乃师在天之灵, 更可以视为余英时作为钱穆学术精神的继承者, 而毕生从事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最重要精神凭据。

[中图分类号] K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70(2021)01-0053-20

一、引言

余英时, 1930 年生于天津, 原籍安徽潜山, 长年研治中国史, 是享誉中外的著名历史学家。他先后分别于 2006 年和 2014 年获颁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终身成就奖 (John W. Kluge Prize), 以及第一届唐奖汉学奖, 其学术地位及影响力, 由此可见一斑。史学界同行形容余英时是“当代最了不起的中国思想史家”, 充分肯定其学识渊博、会通

[收稿日期] 2020-12-19

[作者简介] 叶汉伦, 男, 马来西亚雪兰莪州人, 拉曼大学学院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黄文斌, 男, 马来西亚雪兰莪州人,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副院长, 中文系副教授, 博士。

古今，“他的作品在中文阅读世界里获得广泛的阅读和讨论”〔1〕。余英时著述等身，他的史学研究贯通整个中国历史，从时间上自先秦以迄于今，在研究领域上也有极大的跨越，对中国的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以至中国的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都有所论述，并且将相关领域的知识都融通一贯。这在当代学者中极为少见。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是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余英时的业师，对余英时一生的治学影响至巨。钱穆以自学成家，早年以《先秦诸子系年》为其考证巨构，“为诸子学与战国史开一新纪元”〔2〕，也因其名著《刘向歆父子年谱》而获得顾颉刚欣赏推荐到燕京大学任教〔3〕。抗日战争期间，先后撰写《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等民族史学的代表作，成为现代中国史学经典之著。晚年独力完成《朱子新学案》五巨册，从史学的立场总结朱熹(1130—1200)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成为治朱子学最重要的著述之一。钱穆不仅博通四部，而且毕生致力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化，主张“民族、历史与文化”三位一体的理论论述〔4〕，强调中国学问的贯通，留下了规模宏大的学术遗产。钱穆与余英时师弟子二人在中国史研究中前后辉映，其间的治学渊源脉络清晰，余英时师从钱穆的经过与其学术传承的关键处，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个案。

余英时受业与师承钱穆，其治学无疑受到钱穆的深刻影响。钱穆的另一位高足——严耕望(1916—1996)在一篇深具总结意味的长文中提到：“先生门人长于学术思想史、各有贡献者甚多，余英时显最杰出，我只是先生学术的一个旁支而已”〔5〕，肯定了余英时作为继承钱穆思想史衣钵的传人。余英时在1991年刊行的《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一书中，对其师承渊源以及钱穆的学术影响已有极为扼要的描述。类似的描述，在余英时后来的文字中，特别是在一些有关治学的访谈中，都有或详或简的透露。然而，他于2018年11月正式刊布的《余英时回忆录》(下文简称《回忆

〔1〕 参见美国国会图书馆官方网页上有关余英时获颁克鲁格人文终身成就奖的说明；原文为“Yu Ying-shih has been described by his peers as the greatest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ian of his generation. His knowledge encompasses nearly the entire span of Chinese history,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present, and his work is read and discussed throughout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见 <https://www.loc.gov/item/n81075681/ying-shih-1930/>。日本著名汉学家岛田虔次早在1982年就曾对余英时的学生黄进兴提及，余英时“是他见过的当代最伟大的中国学者”。见黄进兴：《余英时先生的治学经验与风格》，《中华读书报》，2012年7月11日，第10版。

〔2〕 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第23页。

〔3〕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收录《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1册)，台北联经，1998年版，第154页。

〔4〕 黄文斌：《民族自救：论钱穆的历史与文化观》，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5〕 严耕望与钱穆相知甚深，该文完稿于钱穆刚刚故去不久的1991年初，严耕望时年75岁，进入其生命的最后五年，而余英时刚过60岁，显然已卓然有成。见严耕望：《从师问学六十年》，《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台北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0页。

录》)一书中^{〔1〕},对其学术渊源以及师承关系有更细致的描述和解说,对钱穆形塑其治学方面的影响有更为完整的整理与叙述。其业师钱穆亦在八十岁高龄后著有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这些回忆录让我们更为了解师徒两人的生平与为学经历;这也是触发本文之撰述的主要动力。

余英时出于偶然的机遇得以师从钱穆,从学四十年继承其学术衣钵,当中尽有许多值得探索的地方。他在其回忆录第四章开篇就说道:“从燕京大学转入新亚书院,从北京移居香港,这是我生命史上一个最重大的转折点;我的人生彻头彻尾地改变了。”^{〔2〕}纵观余氏早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历程,《回忆录》所记述的人生阶段对其往后超过一甲子的教研岁月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他又在叙述中提及:“1953—1955年间在钱先生指导下精读汉史,对我此下的学术生命确实发生了难以估计的影响。”^{〔3〕}余英时对钱穆的学术传授和熏陶再三致意,终身治学不辍,并且强调继承与发扬“守先待后”这一学术传统在钱、余两代学术传承中的重大意义,可视为钱、余师弟子之间的关键纽带。本文拟以《余英时回忆录》所披露的最新细节,特别从书中抉取余英时从学钱穆门下的过程点滴,以及钱穆对余英时学术发展足以构成重大影响的行谊,并与余英时其他的文章和访谈记录以及钱穆的文字记录相互印证和补充,以期重构余英时师从钱穆的经过及早期交友的全幅图景,并期通过“守先待后”这一观念,进一步探析这段影响余英时一生的师承渊源及其学术传承。

在探讨余英时的师承渊源及其学术传承之前,我们先交代“守先代后”的概念。余英时在一次重要的问学谈话中,曾在论及其治学渊源时提到:中国人重视传统,学术传承,往往以“守先待后”四字加以概括。他并且说:“我在钱先生那里听到这一道理,觉得很合口味。”^{〔4〕}余英时在治学上所坚守的“守先待后”观念,得自钱穆,并以此为终身治学的理念和原则,始终站在史学的立场,阐释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意义。

“守先待后”,既是中国学术传统,也是治学要领,典出《孟子·滕文公下》“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的表述。余英时将本身的中国史研究置放在中国学术传统的脉络上,其治学即是为了“守”中国学术传统之“先”,以待后之学者的承传。换言之,“守先待

〔1〕 作为享誉中外的中国史家,不仅其史著深具分量,其言论也备受重视。缘此,当余氏有意出版回忆录的消息传出,中文读书界无不翘首以待;当回忆录部分章节分别在香港和台湾的期刊连载,即已掀起阅读的热潮。当《余英时回忆录》于2018年11月正式刊布,更是一时洛阳纸贵,限量版精装本立即抢购一空,堪称该年新书出版的“现象级”作品。据著者的解说,他本人一向没有写自传的愿望,回忆录的起源实际上是广州李怀宇对他所做的访谈。在审阅了访谈的稿本之后,他决定转换叙事方式:将原稿的“口述自传”体改变为“回忆录”体,意在“将访谈的重点从我个人的生活和思想转换为七八十年来我个人所经历的世变”。见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序》,台北允晨文化,2018年版,第5—6页。

〔2〕 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2018年版,第92页。

〔3〕 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2018年版,第108页。

〔4〕 何俊编著:《师英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后”可以被视为一种“承”和“传”的精神。由于能“守”，学术会有根本与底蕴，而“待”则能让下一代人将之丰厚而延续。孔子自谦说他对前人的学术是“述而不作”，基本上就是体现了这一种精神。

余英时在撰文阐述钱穆的学术精神时曾经这样写道：“钱先生的学问宗主在儒家，终极信仰也归宿于儒家，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他的基本态度是所谓‘守先待后’（也就是‘述而不作’）；他的主要旨趣是在阐明中国的学术传统，以待后起者之自为。”〔1〕钱穆曾在自己的著述与讲演中一再强调“守先待后”对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实与传统的“传道”理念相通，余英时自是了然于胸，更重要的是他服膺乃师的治学精神，以毕生的著述来传承“守先待后”的学术传统。余英时曾经重复地提起这种治学精神的养成，而钱穆的影响显然至为深刻〔2〕。

钱穆与余英时之间的学术传承一直为学界所注意，唯直接以此为题的论文并不多见。陆玉芹的《钱穆、余英时学术传承管窥——以中西文化观为例》〔3〕，通过中西文化观的视角，阐述了两人对文化的总体看法、对中西文化异同的见解，以及对中西文化的载体——知识分子的诠释；陈静贤的《余英时宋代研究与钱宾四师承论析》〔4〕则以余英时的宋代研究为主从中探索其与钱宾四的学术承传，揭示其中的承先启后的意义。本文试以“守先待后”的观念进一步探析钱余之间的学术传承及其意义。

二、初入钱门

钱穆在1949年至香港并创办新亚书院以前，早已是名满天下的史学大家。1950年，余英时初次谒见钱穆于香港，后来成为钱穆的入室弟子，随后成为新亚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追随钱穆做研究，1955年成为新亚留学美国的第一人，开展了往后硕果累累的学术研究路程。余英时从学于钱穆门下，得到钱氏的亲身指点，不仅开启了其学术研究的启蒙之门，更奠定了他的治学基础。

《回忆录》在著者88高龄之际面世，叙述的时间跨度上起七七卢沟桥事变，从著者自抗战时期的乡居、读书识字及学术的启蒙、中正和燕京两所大学的辗转求学，到正式入读香港新亚书院以迄远赴美国留学，前后近30年的成长经验，时间上跨越了中国政

〔1〕 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第59页。

〔2〕 他在追忆先师钱穆的时候特别写道：“钱先生又一再告诫我不可追逐时尚，斗奇炫博，走上华而不实的斜径。我自己感觉非常幸运，在我步向学术旅程的关键时刻能够得到这样一位良师的当头棒喝。限于才力，我的成绩自然远远没有达到钱先生当初对我的期待。但是我后来常常把钱先生的意思——其实也就是中国传统的为学之方——辗转说给向我问学的青年朋友们听。我勉强做到了钱先生所说的‘守先待后’。”见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序》，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第4—5页；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余英时年61岁。往后的三十年间，余氏仍然恪守此精神如故。

〔3〕 陆玉芹：《钱穆、余英时学术传承管窥——以中西文化观为例》，《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4〕 陈静贤：《余英时宋代研究与钱宾四师承论析》，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文学士荣誉学位论文，2012年。

治上的几个阶段,空间上则从中国大陆多个城乡到南陲香港,再远渡太平洋到美国,信息含量不可谓不广。^{〔1〕}当中,很多细节都是首次披露。尤有进者,余英时的追忆在一些重大事件的关键点上可说是巨细靡遗,更有意将回忆录写成个人经历的现代学术文化史。因其精彩纷呈,对了解著者早期生活特别是其治学的过程意义尤大。从中,特别可以看出余英时从学于钱穆门下所经历的多番转折,颇具戏剧性的色彩,以及随后钱穆在为学做人方面对著者所发生过的深刻影响。尽管这些往事陈迹大致上都在余英时过去的文章和访谈中有所触及,却不如《回忆录》中这般和盘托出的畅快淋漓,当中的细节对事态的演变实际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值得深究。

“初入钱门”是《回忆录》第四章第一节“转学新亚书院”的第一个小节,正是余氏刻意标识意欲详加分疏的重要命题。

余英时原本在燕京大学就读历史系,1950年元旦本意是到香港短期探亲,估计逗留一个月左右,却经不住父亲余协中(1899—1980)的挽留和协助料理家事,遂决定向燕大请假一学期,等到秋季再复学。于是,父亲提议他暂时到新亚书院跟钱穆学点中国史,他欣然同意,同时在内心中明白:“这是父亲想留我在港的方法之一,但是我的归志已定,并未动摇”^{〔2〕}。

余英时追忆当时父亲送他到新亚书院去谒见钱穆,并通过了入学考试而进入新亚的二年级第二学期。这一层考核的经过,早在余英时为纪念钱穆所撰写的《犹记风吹水上鳞》一文中提及,而且更为详尽。然而,该文的记述是指父亲带他到新亚谒见钱穆,钱穆表示他转学必须经过考试,要他第二天来考^{〔3〕}。《回忆录》则指他随父亲面谒钱穆即当下应试,而同时钱穆邀父亲去他房间聊天^{〔4〕}。这两个叙述显然有所出入。因其与本文主旨不相矛盾,故存而不论。

余英时在新亚的第一个学期修了钱穆的“中国学术概论”一课,但由于他“始终认为在新亚是暂时歇脚,暑假后仍将回到燕京,因此不仅对书院不太注意,而且和钱先生也没有课外的交往”^{〔5〕}。

在这段期间,余英时的情感和理智互相冲突最为激烈。他说“在情感方面我自然绝对不愿在这种情况下弃父母于不顾。但在理智层次,我始终不能接受香港这个殖民地可以成为我长期居留之地”,可见当时他认为中国本土才是他安身立命的所在,而学术

〔1〕 余英时自陈从1937年抗日开始到今天,是中国现代史上变乱最剧烈的一段时期,因此如何将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重大变动呈现出来,其意义远大于追溯个人生命史的发展。由此观之,本书的书写策略操作得非常顺利而成功。不难发现,著者在个人的忆述中随时征引相关的文献,作为回忆的佐证,为读者进一步了解相关的事件或时代的背景提供了助力,遂形成了这部回忆录的格外可观之处。

〔2〕 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2018年版,第96页。

〔3〕 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第3—4页。

〔4〕 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2018年版,第99页。

〔5〕 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2018年版,第100页。

研究则是他最为向往的人生道路〔1〕。他甚至盘算到“新亚书院虽有钱先生这样大师在,但开学两三个月以后便已遇到经费的大困难,是否能办下去也在师生心中成了一大疑问”,况且当时新亚的大学资格尚未受到承认。

当时 20 岁的余英时学术的志向已经确定,而且对学术的前途还有自己一套堪说完整的想法,并认为在殖民地香港读书非其长远打算,所以在当年 7 月底他终于束装就道,“狠下心肠,独自坐上去广州的火车”〔2〕。殊不知返回北京的路上出现意外,火车在一个叫做石龙的小站发生了故障,余英时在等待的几个小时中毅然决然地做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新决定:“到广州后,我不但不北归,而且要重回香港”〔3〕。

从过去的文献叙述,我们只知道余英时在 1950 年春天进入新亚书院,投入钱穆的门下,他是从短期探亲变为留在香港念书的,却不晓得原来过程当中还有一段他决意北返,却因火车故障而临时改变主意重回香港,然后继续在新亚念书的转折〔4〕。从他离开香港遇到事故,复又重返香港的这一段经历,可见在当时兵荒马乱及变幻不定的流离岁月,实有很多意料之外的变化。这些意料之外的变化,促成了历史中许多偶然发生的事件,比如说认定自己的生命“只能和中国本土打成一片”的余英时,却在这一“瞬间”的转折中重返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并在此开展了他的中国历史研究的起点,最后成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华裔学者之一。这令人不禁想到:如果当时火车并未发生故障,余英时按原定计划北返燕京继续学业,结果将会如何?这一问题自然没有人能够提供答案,但可以肯定的,余英时师从钱穆继而负笈哈佛的学术道路必将改写。

这一大转折,促成了余英时于 1950 年秋季决定长期留港,并在新亚书院完成大学学业,从那时起他才开始“真正认识新亚书院的性质,并奉钱先生为终身之师”〔5〕。因此,余氏认为他正式进入钱穆门下应该从 1950 年秋季算起〔6〕。

余英时从学于钱穆门下,还离不开父亲余协中的推荐〔7〕。余英时虽在不同的地方多次提到父亲让他到新亚师从钱穆,也曾提过早在内地时期读过钱穆的部分著作并心仪已久。但他是在《回忆录》中第一次提到余协中于 1946 年在沈阳东北中正大学主持

〔1〕 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2018 年版,第 96 页。

〔2〕 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2018 年版,第 96 页。

〔3〕 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2018 年版,第 96 页。

〔4〕 如前述写于 1990 年的《犹记风吹水上鳞》和写于 1995 年的求学自述《我走过的路》都未提及这一层戏剧性的转折。如在《我走过的路》中,余英时仅提到:“1950 年元月初,我到香港探望父母,终于留了下来,从此成为一个海外的流亡者。一个月之后,我进入新亚书院,这是我的大学生活中所走的最后一段路。”参见余英时:《我走过的路》,载陈致访谈:《我走过的路:余英时访谈录》,台北联经,2012 年版,第 11 页。

〔5〕 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2018 年版,第 100 页。

〔6〕 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2018 年版,第 103 页。

〔7〕 已有研究者注意到余协中为余英时推介了钱穆和杨联陞两位良师益友,进一步助推其拓宽治史之路。参见张泓林:《论余协中对余英时史学研究的影响与启发》,《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5 期,第 56—59 页。当然,此文未及注意到《余英时回忆录》的更新披露。

文学院时曾礼聘钱穆担任中国史教授,并得到钱穆同意考虑这项聘任。余协中因此而兴奋地告诉余英时“中国史数一数二的教授钱穆先生要来了”,可惜终未成事,但却是余英时第一次听到钱穆的名字〔1〕。他自此就更多地留意钱穆的著作,显然与父亲余协中的最初推介深有关联。

三、学术指点

正式投入钱穆门下,余英时才开始在课外与钱穆个别接触,并得到他的指点。这种课外求教是从精读钱穆的《国史大纲》开始的。钱穆的现身说法使余英时真正走入了《国史大纲》的内在世界,不仅掌握到《国史大纲》的实质内涵,更亲近地认识到钱穆对求学问所持的基本态度。

余英时在新亚修业期间,有幸在钱穆的亲自指导下细读《国史大纲》,而且写成全书提要一册。余英时这一段问学的经历是特殊的,在他的笔下娓娓道来尤其动人:“每篇提要都经过钱先生评阅,有所审正。不但如此,在阅读和审评的过程中,我对于书中不甚了解或略有疑难的部分——向钱先生请教,他都详细解答,必待我疑滞尽消而后止。”〔2〕余英时认为《国史大纲》是钱穆影响最大的书,有很多深刻的见解,它不是一本普通教科书,“你要懂它很不容易,文章写得太简洁”〔3〕。因为这一深刻的经验和体会,促使余英时在六十多年之后,仍然热切地为《国史大纲》2017年的典藏纪念版特别撰写一篇长达万言的导读文章——《〈国史大纲〉发微:从内在结构到外在影响》。

《国史大纲》自1940年初版以来的八十年间,经过岁月的冲刷、大量的批评和解读,早已成为一部史学经典。余英时不但以此书“随时随地都出现重印的要求”来说明其为经典,更通过司马迁《史记》所标举的中国史学著述之最高标准,即“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来论证《国史大纲》何以成为经典。他认为《国史大纲》建立了一套系统观点,“建立起自己的权威”,成了“一家之言”〔4〕。

尽管余英时在新亚的第一学期修读过钱穆的“中国学术概论”,但真正的从容问学,必须以精读钱穆的《国史大纲》算起。以此入门,余英时得到钱穆在学术上的亲自点拨。

〔1〕 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2018年版,第98页。

〔2〕 余英时:《〈国史大纲〉发微:从内在结构到外在影响》,《国史大纲(修订四版)》,台湾商务,2017年版,第1页。

〔3〕 比如余英时又提到,“《国史大纲》当然有许多很了不得的见解,但是你要对史学史不熟悉你就不容易知道,他有些东西是暗中和陈寅恪商榷的,如关于府兵制的起源问题;有些是很深的问题,针对某些现代说法作争辩,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决的。”见何俊编著:《师英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5—7页。

〔4〕 余英时:《〈国史大纲〉发微:从内在结构到外在影响》,《国史大纲(修订四版)》,台湾商务,2017年版,第2页。余英时更认为柯灵乌(R. G. Collingwood)所说的“建立起自己的权威”(constitution of one's own authority),正是“一家之言”在英文中天造地设的表达方式。有关余英时对柯灵乌这一说法的讨论,可参阅余氏写于1957年的《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收录余英时:《历史与思想(二版)》,台北联经,2014年版,第196—205页。

(一) 建立对于“学问”的认识

余英时在回忆录中提及钱穆指示做笔记须隔一空页以便择录异说作进一步的参考和比较,同时通过钱穆的指点让他认识到“《国史大纲》并不仅仅是直接从第一手资料中钩玄提要而成,同时也充分吸收了现代中国第一流史学家的崭新创获”〔1〕。更为重要的是,钱穆郑重叮咛余英时做笔记须隔一空页以便择录异说,是唯恐余英时一开始即为他的一家之言所牢笼,而失去转益多师的能力〔2〕。余英时着重地指出,钱穆这番指示正充分显露他不肯以自己的“一家之言”掩盖他人的“一家之言”的立场,并认为“这是我们读这部通史经典所必须具备的开放心态。”〔3〕

从《国史大纲》的研读与交流,余英时确认钱穆对于历史知识所抱持的开放态度:“《国史大纲》自然符合司马迁所标举的‘一家之言’,但它决不是‘闭门造车’式的封闭系统。这是他研究中国文化史、思想史的一大特色,推之《先秦诸子系年》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无不如此。”〔4〕

这一套见解,余英时曾在《犹记风吹水上鳞》中表达过:

他的闲闲一语对我有很深的启示,而且他透露出他自己对学问的态度。《国史大纲》自然代表了他自己对一部中国史的系统见解,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是唯一的看法,而充分承认别人从不同的角度也可以得出不同的论点。初学的人,则应该在这些不同之处用心,然后去追寻自己的答案。用今天的话说,钱先生的系统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这个意思,他在《国史大纲》的“引言”和“书成自序”中也隐约地表示过,但是对我而言,究竟不及当面指点,直凑单微,来得亲切。从此以后,我便常常警惕自己不能武断,约束自己在读别人的论著——特别是自己不欣赏的观点——时,尽量虚怀体会作者的用心和立论的

〔1〕 余英时指出,钱穆对现代中国第一流史学家如王国维、梁启超、夏曾佑、陈寅恪、顾颉刚等的创获都加以充分吸收,对于近贤新得不但随时采择,而且在撰《国史大纲》时更从通史角度另作斟酌,有所调整,然后才写入书中。所以他一向认为“《国史大纲》融贯了从清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史学的主要成就”。见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2018年版,第104页。通过钱穆的现身说法,余英时才渐渐明白原来钱穆多年在北大等校讲授中国通史的过程中,读遍了同时史学专家在一切重大关键问题上的研究文字,然后根据他自己的通史观点而判定其异同取舍。比如有一次他们讨论到西魏府兵制,钱穆向他说明本身和陈寅恪的看法有何异同之处:“他认为陈寅恪过分强调了宇文泰个人私心在府兵制成立上的作用,而他则宁可从胡汉势力的消长上去着眼。他很推崇陈寅恪的贡献,但认为专题考证的具体结论和通史所需要的综合论断未必能完全融合无间。”从中,余英时更深入地了解钱穆的学术观点,特别是在通史撰述的取舍方面的考虑。他说:“我举此一例,以见《国史大纲》并不易读。因为钱先生写通史时惜墨如金,语多涵蓄,其背后不仅是正史、九通之类的旧史料,而且也包含了整个民国时期的史学史。”见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第9—10页。

〔2〕 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2018年版,第104页。

〔3〕 余英时:《〈国史大纲〉发微:从内在结构到外在影响》,《国史大纲(修订四版)》,台湾商务,2017年版,第14页。

〔4〕 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2018年版,第104页。

根据。^{〔1〕}

很显然,余英时在这篇纪念文章中的描述比《回忆录》中写得更为直接而透彻,也可见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下笔更为谨慎、更加惜墨如金,与钱穆撰写《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的风格如出一辙^{〔2〕}。重要的是,余英时在钱穆的耳提面命下认识到钱穆对于历史知识所抱持的开放态度,并从中认识到业师开放的学问系统,进而建立起本身对于“学问”的认识。

余英时治学认真而用心,能够学思并进,可谓读书得间,但是从学于钱穆这样的大学者,更让他理解到认真细读于字里行间,“究竟不及当面指点,直湊单微,来得亲切”。研学过程中,钱穆亲身展示了对于历史知识抱持开放的态度,更使余英时认为受到他影响最深最大的主要在建立了对于“学问”的认识^{〔3〕}。

(二)如何读中国文史哲的典籍

据余英时的理解,钱穆钻研中国文史哲典籍的重点乃是放在“文本内内外外的彻底认识上面”^{〔4〕}。余氏的这一段叙述令人耳目一新,使人对钱穆的学术有了不同的理解面向。此文本内外的彻底认识,余氏的解说是:内则“一字之义”必不可放过,相当于清代学人所强调的训诂之学;外则对文本必不可作孤立的理解,而当和同类的文本加以异同的比较,然后才能认清它在整体历史脉络中的真实地位^{〔5〕}。

钻研与撰述中国文史哲典籍之法相通。余英时心知其意,而能融会贯通、推陈出新。《方以智晚节考》和《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可作为这方面的代表,余英时自谓两书“皆考证之书,然其旨则有超乎一人一事之考证以外者,盖亦欲观微知著”^{〔6〕}。余英时认为,以《方以智晚节考》为例,此书所考者,为“古人之心也”,其重点与传统考证方法略有不同之处。为解古人之心,实证与诠释二法宜于参伍以求、交互为用。他坚信,治思想史仍守知人论世之旧义而不欲堕于一偏。“论世必尚外在之客观,故实证之法为不可废;知人必重内在之主观,故诠释之法亦不可少。”^{〔7〕}余英时认为治思想史则实证与诠释两者不可须臾离,因为内外合一、主客交融乃思维之所由起。

钱穆对余英时这一治学绩效极为欣赏,认为“推定密之死在惶恐滩一节,更可谓思

〔1〕 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第9页。

〔2〕 余英时曾提到他曾一再请求钱穆将所知学坛掌故写下来,以为民国学术史留下一些珍贵的资料:“这也许有助于他后来下决心写《师友杂忆》。但是《杂忆》的文字还是太洁净、太含蓄了。这是他的一贯风格。”参见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第12—13页。

〔3〕 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2018年版,第103页。

〔4〕 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2018年版,第104页。

〔5〕 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2018年版,第104—105页。

〔6〕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自序(增订一版)》,台北允晨文化,2011年版,第12页。

〔7〕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自序(增订一版)》,台北允晨文化,2011年版,第12页。

人微茫精通玄冥,三百年前人所怀心事,为三百年后人重新发得”〔1〕。钱穆又谓余英时特撰“俗缘考”一节,于密之生活之内外面,入世出世双方皆得披豁兼尽,朗若列眉。可见此为文本内外彻底认识的具体落实,于古人之言必不可放过的同时,又能比较异同,从而认清其在整体历史脉络中的真实地位。

(三)授业、解惑、传道之方式

余英时在回忆录中进一步解释,钱穆教学的具体着手处,是在“授业”和“解惑”上面,“传道”则寓于其中。他清楚地指出钱穆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也就是他所信奉的儒家的价值系统(即相当于古人所说的“道”或“道统”),但他并不把自己的价值系统直接向余英时灌输。据余英时的领会,钱穆似乎认为只要他具备了读书和研究的基本能力,最后自己便能找到“道”。余英时理解到钱穆始终鼓励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求得一种“深入的整体了解”,找出它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文明体系的特征所在。余英时认为这就是钱穆心中的“道”〔2〕。

钱穆“传道”的方式和态度自然与他对学问的看法相关。他曾劝诫后学从事学问,“要能自得师,要能上师古人,当知读书即就如从师”〔3〕。钱穆对于师道既有深切的领悟,对于“传道”亦有严谨的态度。前面就提到他指示余英时治学须抱持开放的态度,唯恐余英时一开始即为他的一家之言所牢笼,而失去了转益多师的能力。因为钱穆始终认为:“每一人之聪明,不仅自己不易知,即为师者,亦未必能知。……所谓‘转益多师是我师’,从此可以发现自己才性所近。”〔4〕他认为求学该先涉猎,先筑广大基础,先知学问之大体系与大格局。如“不向更广大的基础上用力,常不易有更崇高之树立”,他认为“这在学问上是最值得注意的”〔5〕。

这一观点对余英时的影响很大,他在后来的一篇自述中就真切地提到钱穆在中国史学上的深厚造诣对他的启示极大:“我深知,无论我的观点是什么,我都必须像钱先生那样,最后用学问上的真实成就来建立我自己的观点。我必须暂时放下观点和理论,先虚心读古人的经典,而且必须一部一部地仔细研读。我不能先有观点,然后在古籍中断章取义来证实我的观点。这样做便成了曲解误说,而不是实事求是了。”〔6〕由此可以理

〔1〕 钱穆:《余君英时方密之晚节考序》,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自序(增订一版)》,台北允晨文化,2011年版,第13页。

〔2〕 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2018年版,第105页。

〔3〕 钱穆:《关于学问方面之智慧与功力》,《中国学术通义》,台北素书楼文教基金会·兰台出版社,2000年版,第284页。

〔4〕 钱穆:《关于学问方面之智慧与功力》,《中国学术通义》,台北素书楼文教基金会·兰台出版社,2000年版,第286页。

〔5〕 钱穆:《关于学问方面之智慧与功力》,《中国学术通义》,台北素书楼文教基金会·兰台出版社,2000年版,第286页。

〔6〕 余英时:《我走过的路》,载陈致访谈:《我走过的路:余英时访谈录》,台北联经,2012年版,第12页。

解,钱穆在师者“传道”方面,强调保持开放的态度,做学问贵在自得师,也要求上师古人,从中发现自己的才性,并依据才性所近在学问上自由发展,通过坚实的研究成果来建立本身的观点,而不是抱持着本身的私见来寻找证据。

这一点可与钱穆的学术立场交互印证。余英时曾作长文力证钱穆虽以抉发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而必然要归宿于儒家思想,却不是一位“新儒家”。他说:“钱先生反复强调门户之见必须打破,这和他在学术上的‘宗主’有密切的关系。他一向认为中国学术传统以贯通和整合为其最主要的精神。经、史、子、集虽分为四部,四部之内又各有千门万户,但是所有部门都呈露中国文化的特性,因而也都可以互通。”同时钱穆常说,“通儒”自然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不是人人都能企及的,“凡是足当通儒之称的大概都是较能破除门户之见的学人”〔1〕。

基于钱穆的“史学立场”,他一方面告诫学者勿陷入门户的偏见,另一方面又强调现代学者只能走专门化的道路,不能再妄想作“教主”或“导师”。余英时认为这一叙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所说的‘通儒’(或‘通才’)的涵义”,这反映出钱穆心中的“道”,同时也可以看出一位“通儒”授业、解惑、传道的方式。

(四)新亚研究所时期“深造自得”的实践

余英时在回忆录中着重地提到,他向钱穆从容问学是在毕业以后,特别是1953—1954学年。他进入新亚研究所,每天到研究所读书,这一年内几乎天天和钱穆见面,并在钱穆的提示下进行正史精读,从《后汉书》开始,并在第二年上推至《汉书》,下延至《三国志》。他详细地解说他如何精读正史,并将所有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各方面的变动记录在卡片上并加标示,以便将来作分门别类的研讨。这是余英时第一次提到他的读书方法和卡片记录。

近两年的精读详记,余英时所写的卡片累积了一千多张,“奠定了我中国史研究的基础”〔2〕。此处“奠定基础”之谓,并非泛泛而论。他进而指出,凭着这些积累,他在1955年春夏之交开始撰写专论,1956年1月即在美国哈佛大学脱稿,全文约六万字,定名为《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刊于1956年出版的《新亚学报》第一卷第二期),这是他的第一篇史学专论。1959年,他完成了十万字的专论《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刊在1959年《新亚学报》钱穆六十五岁祝寿专号);1958年他写了《汉代中外经济交通》论文,并在此基础上扩充成1967年出版的专书《汉代中国的贸易与扩张》;这三部作品都是在那两年详记卡片资料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因此,余英时回顾早年的研究经历,清楚地指出:“1953—1955两年间在钱先生指导下精读汉史,对我此下的学术生命确实发生了难以估计的影响。”〔3〕显然,这一结论

〔1〕 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第33页。

〔2〕 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2018年版,第106—107页。

〔3〕 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2018年版,第108页。

完全是实话,而且是此前所未见的有关余英时个人经历的一段独家披露。这段时期极为重要,因为这是余英时在钱穆的直接指导下,正式研究中国史的开始,因此他说,“我一生的学术路向可以说是在这一阶段奠定的”〔1〕。

四、师生早期交谊

从回忆录的角度言,余英时直说,他与钱穆之间的关系不仅仅限于学术方面,“在师生情感上,则有更多值得回忆的地方”〔2〕。他在《回忆录》中追忆了钱穆与他一家在山顶或海滨的欢聚,特别是一次石澳海边一整天的盘旋,以及1960年6月下旬钱穆夫妇与余英时一家在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湖边风景区一星期的欢聚。这些事迹都曾出现在《犹记风吹水上鳞》文中,但《回忆录》所记述的笔墨更多更浓。余英时可说是在患难中从学于钱穆,彼此的感情不限于师承的关系,而更超乎其上。钱穆不仅关心余英时在学问上的精进,在他留学美国、就业和生活等方面,钱穆都投以巨大的关注。

(一)推荐到哈佛进修

1955年,余英时到美国哈佛大学进修。这是“意外中的意外”,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余英时回忆这件事,是从引述钱穆《师友杂忆》中提到派送余英时赴美而终成为“新亚研究所派赴国外留学之第一人”开始的。他补述了《师友杂忆》中所未详及的内容,以及获得录取后办理法律手续所遇到的阻力,终致他在哈佛于9月中旬开学后的10月3日才离开香港。当中的原委即是因台北当局判断他为反国民党的“第三势力”而不发出护照,最终通过宣誓自己为“无国籍之人”,以此证明文件代替护照才得以获得美国签证而终于成行。此事自然已曾在多种场合获得披露,其中交代最为详尽的就是在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版中的《书成自述》(页1—3),当中提到:

钱宾四师虽曾出面说明我其实只是新亚书院的一名“助教”,但仍未发生效力。最后由于友人介绍,得到亚洲协会(Asia Foundation)驻港代表艾维(James Ivy)先生的说项,美国领事馆允许我到律师事务所取得一种临时旅行文书(“affidavit in lieu of passport”),以“无国籍之人”的身份发给签证。〔3〕

《回忆录》中清楚交代钱穆在了解了情况后,特别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公函给台北“行政院”,但因安检一关不能通过而没有发生丝毫作用。艾维对钱穆极为尊重,也是通过钱穆传话,要余英时跟他当面一谈,最后再修书给美国驻港总领事才促成此事。这番周折在余英时心中烙下深刻的印记,“无国籍之人”的身份也为余英时带来多年的困扰,甚至是促使余英时撰写《〈论再生缘〉书后》一文的心理背景。可见此事对余英时的实际生活和人生态度都造成重大影响,钱穆在此过程中也发挥过作用,终在《回忆录》中看到更多

〔1〕 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2018年版,第106页。

〔2〕 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2018年版,第108页。

〔3〕 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东大图书,2004年版,第3页。

的眉目。

钱穆不仅在促成余英时到美国访学进而在哈佛进修提供了助力,也为余英时日后学成归来在新亚书院的就业前途投注过很多的设想和心力,务求余英时能够稳妥地踏上学术的道路。从钱穆的《素书楼余渾》所收录致余协中的两通信函中,均提及希望余英时由美国学成归来,相伴在侧讨论学术。钱穆不仅仅是期盼,甚且设法为余英时一家做出妥当的安排,无论是余英时回到香港的就业与学术的研寻,或是一家人的生活,钱穆都做过通盘的考虑。

(二)“远到”的叮咛

新亚生活在余英时的生命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那段困窘的流亡生活让他印象深刻,以致他在不同的地方都一再忆述他在新亚肄业的那一段“困乏多情”的岁月。当时正值新亚经济上最困窘的时期,钱穆必须到处奔走募捐经费,甚至在1952年的台北讲演,屋顶坍塌导致头部重创而须留台养伤,以致新亚的第一届毕业典礼,钱穆也无缘出席。这些都是熟知钱穆事迹的人耳熟能详的经历,余英时也多番留下文字记录。但这一回,余英时提到钱穆须留台养伤,“直到8月才回香港,以致7月12日我的毕业典礼他都未能主持,我当时是相当失望的”〔1〕。这是余英时对他的大学生涯的总结,第一次表达钱穆的缺席对他造成的失落感。

钱穆与余英时师生感情深厚,往往又超越了一般师生感情之上,钱穆平时对余英时的关怀“有如家人子弟”。余英时追忆:“有时和他单独谈话,我深深感受到他对我的精神以至身体的健康十分关切,甚至还在学术得失之上。”他紧接着在《回忆录》中引了1960年5月28日钱穆在耶鲁给他所写的一封极长的论学信,其中提到:

又念弟之生活,却似梁任公。任公在日本时,起居无节,深夜作文,日上始睡,傍晚四五时再起床。弟求远到,盼能力戒,勿熬深夜,勿纵晏起。心之所爱,无话不及,谅弟当不为怪也。(《素书楼余渾》,全集本,页430)

这一封论学信,余英时最初将它附录在《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2〕,以便与同样有志于治中国学术思想史者共享。后来,他在为《钱穆先生书信集》所写的序言中特别提及这段话,还说“当时读到这一段话时,热泪盈眶,感愧交并,至今记忆犹新”〔3〕。《回忆录》中他再次提到钱穆显然担心他步梁启超(1873—1929)后尘,不能终其天年。这一次他说:“当时读到这几句话,我的感动是无法用文字来描述的。”〔4〕

〔1〕 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2018年版,第110—111页。

〔2〕 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第249—255页。当时信函日期标记为1960年5月21日。

〔3〕 黄浩潮、陆国燊编著:《钱穆先生书信集:为学、做人、亲情与师生情怀》,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2014年版,第6页。

〔4〕 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2018年版,第111页。

显然,余英时尽管感动莫名,但是并未遵从师嘱改变工作的习惯,依然是深夜写作。唯至米寿而笔力犹健,足以告慰钱穆在天之灵。但余英时一再地在叙述中提及这段话,则显然表明钱穆一番深情的劝勉和高远的期望,正是余英时时时刻刻念念不忘的恩义,也显然想借钱穆的劝谕转告后来的学者,当中蕴涵着一种隽永的“守先待后”的深意。

钱穆对余英时自然是关心体贴、盼望殷切,深信这名弟子在治学上能有大成,必有“远到”之期。这在钱穆写给余英时的书信中可见一斑。举以下几个例子以概其余。1958年1月26日,钱穆对远在美国的余英时写道:

学问之事,备具天分,仍须济以工力,否则虚以为盈,中途而辍,鲜能大成。

吾弟天资英发,惟期一意沉潜,立志远到,此穆之所夙望。〔1〕

1958年3月19日,他又写道:

十日来书已到,所论甚见心胸开拓,识趣远到,循此努力,将来当大有成就。穆教课各大学历三十年,得见如弟英发,诚为欣慰。〔2〕

隔年的1959年5月24日,钱穆在信中说:

顷诵来书,所论似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若循此不已,他年所指当臻深邃,快慰何极。……

吾弟聪慧早达,惟望于古人承当处,亦能直下承当,一念之微,规模立而精神见。外此惟待年力,宽心待之可也。如内心无所承当,则一切聪明气力皆失其根源,波澜荣华尽不足贵。此意盼潜体默会,必于此有得,乃始足最上一关也。〔3〕

钱穆对余英时的爱护之情溢于言表,对中年以后所收的这位弟子寄予了最高的期许,而余英时后来的表现和成就亦足以告慰业师,并且对钱穆的启蒙与知遇之恩也有深刻的体会:

他不但关怀学生的学术成就,尤其对学生的生活状态和为人处世,关心备至,体贴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就我所读过的现代第一流学人的信札而言,大概只有梁启超(任公)和他相近。〔4〕

余英时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而钱穆仍期盼他能在学成后返回香港,继续中国史的研究著述。钱穆的这一番心意,在1959年12月21日给余协中的信里表达得

〔1〕 黄浩潮、陆国燊编著:《钱穆先生书信集:为学、做人、亲情与师生情怀》,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2014年版,第75页。

〔2〕 黄浩潮、陆国燊编著:《钱穆先生书信集:为学、做人、亲情与师生情怀》,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2014年版,第78页。

〔3〕 黄浩潮、陆国燊编著:《钱穆先生书信集:为学、做人、亲情与师生情怀》,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2014年版,第83—84页。

〔4〕 余英时:《余英时教授序》,黄浩潮、陆国燊编著:《钱穆先生书信集:为学、做人、亲情与师生情怀》,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2014年版,第5页。

最为显著：

弟常与内人谈起，只望明年远游归来，学校事能乘此摆开，多得清闲，有英时等数人时时过从，谈论学术，放情山水，弟当自买一车由内人驾驶，家中时时备一两味家常菜，邀英时等三数人聚餐会游，弟之理想专在此处。若老兄能赋归欤，更增欢乐，外此实无足道者。弟又告内人，英时天资英发，实似往年张君荫麟，而醇厚过之，必有远到之期，此不仅兄之老福，亦弟晚年心情所切盼。若使英时能在弟身旁亲眼看其一日千里之脱辔绝驰，弟之心情盖无愉快过于此者。得一后起人才殊不易，弟为新亚化了十载心血，却要向英时身上索偿。以此告兄，想不怪弟之无聊或过分也。^{〔1〕}

在钱穆的眼中，余英时天资英发，必有远到之期，而期盼他能留在身边，时相论学，并见证他学问上的持续精进。而日后的发展与变迁，证明钱穆的眼光独到，余英时在哈佛取得博士学位后，在学术上展现非凡的成绩，不仅在美国学界很快地站稳脚跟，随后在美国多所常春藤大学任教，并以中文著述在中国史研究领域里受到广泛的关注。尽管钱穆希望余英时在身边日进千里的愿望未能实现，但余英时依然继承他的学术衣钵，在中国学术思想史方面建立起卓越的贡献。

五、“守先待后”：学术衣钵的传承

钱穆与余英时作为两代杰出史学家，前后辉映。无论是在著述的数量方面，还是其所涵盖的学术领域方面，都非常可观。要在一篇短文的篇幅内对他们学术衣钵的传承展开全面的评估是不可能的，只能依据余英时本身所述及的几个主要的方面展开简要的探讨。在一篇重要的访谈中，余英时切实地提到钱穆对他影响大的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他强调治中国历史，看书要广博，要前后贯通，我后来特别是研究思想史就证明他说的完全是对的。思想是联系起来的，先秦的历史思想搞不清楚，下面也是模糊的。第二是他强调中国文化有自己的特色，必须潜心探讨。^{〔2〕}

在另一篇重要的访谈中，余英时同样明确地指出钱穆对他治学所带来的关键影响：

我研究中国思想史是通过他的著作而展开的，如我写汉晋之际新思潮和章学诚等都是显例，并且得到他的点头，见于他的书信中，他是我师从所出，毫无问题。总之，我的经验是：只有多读书，在学问上建到某种高度，才能对他有可靠的认识。^{〔3〕}

余英时是钱穆属意的学术继承人，对钱穆的治学观点和特点心领神会，对钱穆的学问

〔1〕 钱穆：《素书楼余渚》，台北联经，1998年版，第206—207页。

〔2〕 陈致访谈：《我走过的路：余英时访谈录》，台北联经，2012年版，第46页。

〔3〕 何俊编著：《师英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7—8页。

“有可靠的认识”，而且服膺钱穆的治学方法，并继承了钱穆的学术精神和思路，持续展开探索。以下仅就余英时文章中所提及的主要面向进行扼要的探讨。

（一）综合贯通的史学研究

余英时认为史学研究是“综合贯通”之学，这里所说的“综合贯通”是指史家在研究某一时代历史事象时不但一方面要照顾到该事象在其前后时代中的纵的线索，而且另一方面还要考察它与其同时代一切有关的事象之间的各种可能的横的关系〔1〕。余英时曾忆述钱穆对他的提醒：“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必须在源头处着力，不能以断代为限。”〔2〕他对这句话终身不能忘记，并时刻引为研治中国史的重大原则。

从史学的立场出发，余英时认为学历史的人考虑的是“通古今之变”的问题。“古今怎么变化，那必须有一个整体的构想。在古今之变中，就有具体的如何‘通’的问题。……‘通’的观念永远在我心里。”〔3〕中国传统学术“通”与“专”的分辨时刻藏于余英时的心中。他从与钱穆的论学中，逐渐领悟到中国传统学术一方面自有其分类和流变，另一方面又特别注重整体的观点。这一项“专”与“通”的大问题并不容易解决：

如果单纯地依照西方的分类，各人选一专门的范围去进行窄而深的断代研究，当然也会有成绩。但在熟谙中国传统的人看来，总不免有牵强和单薄之感。如果过分注重“通”的传统，先有整体的认识再去走专家的道路，事实上又是研究者的时间、精力、聪明都不能允许的。〔4〕

余英时确实是一位慎思明辨的学者，对“专”与“通”的问题有自己的一番领悟。他了解到钱穆因为天分和勤奋，加上择善坚持自己的路向，最终走出了自己独特的“以通御专”的道路〔5〕。但此一道路并非人人能走。余英时则藉由一项接一项不同主题的专题研究，运用蕴藏在心中的“通”的观念，对每一项历史事实或每一个历史阶段的转化，都要求贯通起来，形成了余英时中国史研究中一种贯通的长程历史观察和理解，走出了自己“以专济通”的新路〔6〕。这个“以专济通”的方法，正是在现代专业分工，在史学上重视专题研究的原则之下形成的。余氏重视历史情境的再现，也采取“以专济通”的方式择定历史上重要的转折阶段，着重从历史脉络中寻绎出历史发展的过程 and 变化。

（二）抉发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

余英时继承了清末以来中国知识人共同关怀的中西文化异同的大问题，并一直相信只有历史研究才是寻求解答这一问题的可靠途径。中西文化异同是余英时所继承的

〔1〕 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回顾与展望》，《史学与传统》，台北时报文化，1982年版，第15—16页。

〔2〕 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序》，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第4页。

〔3〕 参见《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余英时：《学思答问：余英时访谈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页。

〔4〕 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第10页。

〔5〕 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第10页。

〔6〕 《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余英时：《学思答问：余英时访谈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页。

历史研究问题,而且既是“学术问题”,也是“现实问题”〔1〕,所以余氏以西方为对照来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性所在。这当然也是钱穆所秉持的治史信念。

余英时于2014年9月19日在台北接领第一届唐奖汉学奖时坚定地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古老文明不但起源于本土,而且大体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因此“不但中国文化各具特色,而且它的发展途径也是独特的”〔2〕。他就以比较中西的文化和历史来找出中国文化的特色,并对此寄以厚望,相信也许在不太遥远的未来,“中国文化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独特传统”,终将成为史学研究的基本预设之一〔3〕。在此,钱穆的学术影响是清晰可见的。

这种学术眼光和治史原则的养成,自然与余英时亲身投入治学数十年的经验累积分不开,但是究其根本,更与钱穆的耳提面命和身体力行的熏陶密切相关。余英时在分析钱穆一生治学的旨趣要领时指出:“在30年代,钱先生是以擅考证见称于世的,虽然他从来不掩饰他对于传统文化的尊重,也不讳言他的考证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服务——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4〕这一股文化信念也感染着余英时,引领着余英时同样以坚实的史学研究去寻找中国文化独有的精神、抉发中国文化传统独有的特色。

从余英时不同时期的著述可以看出,尽管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不断变化,他时时以比较的眼光抉发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以及历史阶段的变化。综观余氏史学,可见其重视在脉络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找出变化,特别是在知识人研究中着重探析中国思想史上的突破时期,藉此突显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

(三)士与知识人的研究命题

知识人研究是余英时治中国史的一大主轴,论者认为余氏“承负、诠释与光大中国知识人传统”〔5〕。他曾直截提到:“钱(穆)先生一向注重‘士’在中国史上的无比重要性,我很受到启发。‘士’成为我的研究重点之一也起于这一渊源。”〔6〕事实上,钱穆也在其著作中缕述士人在中国历史上的角色,他认为作为中国文化自觉载体的“士”在文化传统上有其特殊的意义价值,十足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钱穆以中国的士与知识人为专门对象的研究,就其论著篇目看,除了散见于《国史大纲》《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文化精神》等著作外,其论中国知识人最重要的文章包括《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文

〔1〕 余英时:《我走过的路》,陈致访谈:《我走过的路:余英时访谈录》,台北联经,2012年版,第12页。

〔2〕 余英时:《中国史研究的自我反思》,《汉学研究通讯》,2015年2月总133期,第4页。

〔3〕 余英时:《北京三联书店“余英时作品系列”总序》,收录余英时:《厄言自纪:余英时自序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2页。

〔4〕 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第25页。

〔5〕 丘慧芬:《承负、诠释与光大中国知识人传统的余英时》,收录林载爵主编:《如沐春风:余英时教授的为学与处世——余英时教授九秩寿庆文集》,台北联经,2019年版,第63—96页。

〔6〕 何俊:《师英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

化传统中之士》《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后来均收录于其《国史新论》一书，成为钱穆中国史论述的重要构成部分。余英时认为钱穆“把中国的未来寄望在‘士’的浴火重生上面”，而余英时则相信“中国是否能走上现代文明的坦途，知识人作为一个群体占有关键性的地位”〔1〕。

余英时继承了钱穆关于“士”的人文关怀的观点，把“士”与“中国文化”联合起来考察，“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文化和思想的传承和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2〕，他通过“士”这个阶层的历史发展来探索中国文化的独特形态，同时说明中西知识人的异质所在，并对中国现代知识人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余英时在抉发知识人于中国重要的转型阶段所发挥的文化动力的努力上，与钱穆如出一辙。在余英时所处理的各类知识人议题中，也与钱穆所耕耘过的议题多有志趣相投的地方。

首先让人想到余英时七十万言巨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的问世，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形成了一道独特的学术风景。很多人都不期然地以钱穆晚年的《朱子新学案》相比较，认为其中当有某种传承的意味和意义。

其次，余英时在84岁之时，出版《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从比较文化史的观察角度，探索中国轴心突破的历史世界。他在该书的第一章就提到钱穆晚年也谈到“天人合一”的观念。余氏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他（钱穆）是我的老师，当年我受到他的影响，接受了他的问题，把这个问题重新研究。因为他也没把这个问题专门写一本书介绍，只是各种各样的散文。”〔3〕

然而，余英时“新天人合一”观点的熔铸，被视为执行先师钱穆的学术遗嘱之意〔4〕。余在《论天人之际》的《引论》中介绍了钱穆去世前三个月口述《天人合一论——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的情景：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彻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5〕。余英时认为此文可视为钱穆的“晚年定论”，文章虽短，但在其学术生涯中极为重要。

与业师相仿，余英时的论断是：中国轴心突破最后归宿于“内向超越”。内向超越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人”和“道”的合一，也就是轴心突破以后的新“天人合一”〔6〕。余

〔1〕 何俊：《师英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26页。

〔2〕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引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3〕 李怀宇：《内向超越的最高境界是“人”和“道”合一：余英时谈新著〈论天人之际〉》，《思想》，2014年5月第25期，第322页。

〔4〕 王学泰：《轴心突破之后，如何应对世俗社会？——读余英时著〈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新京报》，2014年9月27日；转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研究”网站：<http://jds.cass.cn/Item/26747.aspx>。

〔5〕 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台北素书楼文教基金会·兰台出版社，2001年版，第376页。

〔6〕 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台北联经，2014年版，第249页。

著洋洋大观,广征博引论证中国轴心突破的历史进程,直指其最后归宿于“内向超越”。葛兆光先生为此说道:

我当然理解,余先生对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内在超越”,有一种特别的关注,他一生对传统中国文化抱有同情,尤其是对与(经由以色列宗教和希腊哲学的汇流而形成的)西方“外在超越”传统不同的,中国的“内在超越”文化传统,有类似钱穆先生所说的“温情”。〔1〕

余英时自承当年受到老师的影响,接收了他的问题,对问题重新研究,因而成就了一部论说宏大的专著,其中亦应饱含学术传承的温情与敬意。余英时与钱穆在研究论题上的“偶然”相叠,显然有师承的影响。余英时对相关论题有所接触及兴趣,进而延伸探讨,遂成许多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巧合”。

在这个关键处,我们可以看到“守先待后”的学术传统在钱、余二人身上的先后显现。基于这一层认识,我们能够确定,余英时从思想起源的角度畅论“天人合一”,对中国思想的起点展开探源溯流的考察,不仅仅在执行先师的“学术遗嘱”,更重要的是,这一关乎中国思想起源、乃至人类文化发展前途的重要议题,必须经过彻底的研究和清理,以利来者的深入探讨。除了师承渊源的内在联系,阐扬中国学术文化传统,在学术上坚持“守先待后”的精神,才是余英时延续钱穆的初步探索,而自行深入钻研的治学依据。

六、结语

余英时与钱穆的师承关系深厚,钱穆对他的影响至深至巨,彼此的交谊甚至超越师生情感之上,达到了一种学术传统的传承。这种超越一般师生关系的学术传承,是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2〕。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香港,钱穆不但无权无势,连吃饭都有困难;这和新亚得到美国雅礼协会的帮助,特别是新亚加入中文大学以后的情况,完全不同。余英时曾说:“我们早期的新亚学生和钱先生都是患难之交。”〔3〕

这一段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学术传承,以守护和发扬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为纽带。余英时在钱穆身后撰写长文力证钱穆以抉发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1〕 葛兆光:《学者葛兆光谈余英时〈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3月16日:<http://cul.qq.com/a/20140319/015731.htm>。

〔2〕 余英时就自陈:“我们师生之间的情感是特别的,因为它是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四十年来,这种情感已很难再用‘师生’两个字说明它的内容了。”见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第2页。

〔3〕 余英时的忆述可为“患难”的注脚:“钱先生虽然在中国是望重一时的学者,而且我早就读过他的《国史大纲》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曾在燕大图书馆中参考过《先秦诸子系年》,但是他在香港却没有很大的号召力。当时新亚书院初创,学生一共不超过二十人,而且绝大多数是从大陆来的难民子弟,九龙桂林街时代的新亚更谈不上是‘大学’的规模,校舍简陋得不成样子,图书馆则根本不存在。”见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第3-6页。

为治学的宗主,即是余英时所标举的“为中国招魂”;他充满说服力地指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即是钱穆“招魂”之作,但“招魂”意识全幅呈露的代表著作必推《国史大纲》为第一,“引论”则是钱穆对于“中国魂”的新诠释〔1〕。

在这篇题为《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名篇中,余英时的言词直接真挚。他指钱穆一生为中国招魂,虽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然而钱穆并没有绝望。余氏进一步引申:“钱先生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中国旧魂原封不动地还阳,而是旧魂引生新魂。”〔2〕这一说法无疑触及了钱穆学术文化思想的真精神,也是“中国不会亡”的精神依据。他最后强调:“我们应该承当起钱先生的未竟之业,继续为中国招魂。”〔3〕余英时坚持钱穆所叮嘱的“守先待后”的传统治学之方,以一生扎实的研究成果来验证并发扬这种“守先待后”的治学传统。这一番誓词,不仅是告慰乃师在天之灵,也是一句文化宣言,更可以视为余英时作为钱穆学术精神的继承者,而毕生从事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最重要精神凭据。

钱穆情感丰沛,目光远到,余英时的评述自然是知人之言;余英时与钱穆同样相信“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钱穆的教诲言行影响了余英时一生的为学做人,回首前尘,与钱穆相处的日子令余英时记忆深刻,《回忆录》对此留下的笔墨尽管不多,但印记清晰。因而我们不难理解,《回忆录》书首所录就是余英时在88岁回忆旧事之际重新题写的《寿钱宾四师九十》四首之一:“海滨回首隔前尘,犹记风吹水上鳞”。因为钱穆与余英时师徒在患难之中相遇,在学术理念上多有相契,因此早年的新亚岁月在彼等的人生中留下的印记显得特别深刻。

从学术成长的历程来看,新亚问学这段时期对余英时尤为重要,因为这是奠定其往后治学方向和规模的关键时刻。藉由《余英时回忆录》的披露,以及与其他文字记录相互印证,余英时师从钱穆的曲折经过、早期交谊的师承渊源,及其中的学术衣钵的传承,已可略见其轮廓。余英时不仅继承钱穆的优秀学统并发扬光大,同时更坚守学术意义上的“守先待后”。纵观余氏史学,发挥“守先待后”之精义当为治中国史之要义。

[责任编辑:刘一兵]

〔1〕 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第26—27页。

〔2〕 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第29页。

〔3〕 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第29页。